

28.07

文史资料

(115)

泾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八月四日

八年抗战中的泾川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声，激起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义愤，僻处西北的泾川，各界人民，在敌前、敌后，同仇敌忾，为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输送了大批兵员。全县在1937年后季分两期征送新兵800名。1938年以后，按年定额分月配征，自1937年后季至1941年底，共征送新兵6,129名；1942年至1945年8月，共征送新兵5,599名；1944年由于战事吃紧，发起一甲一兵运动，全县1,360甲，征送新兵1,360名。此外，先后选送宪兵45名，学兵40名，知识青年军90名。八年中共征送各种新兵13,263名（包括以马代丁，不包括补充地方保安自卫团队的兵员）。在父老兄妹的鼓励下，勇敢地奔赴各个战场，汗水洒遍了大半个中国，不少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军粮。马秣。自抗战开始，省令举办年度预算，将原征地丁银和屯粮，统一折算，改征实物。全县每年征实小麦23,813.8石(1,905,104公斤)。至1941年共征交小麦9,525,520公斤。1942年由于日寇扩大侵略，我抗击力量加强，军需供应相应增加，照土地陈报后新定科则征收，田赋粮额为33,949.5石，再加购军粮一倍，共折征小麦5,431,920公斤。1943年和1944年，田赋照原额征军粮加一倍，再加征三成公教粮，每年田、军、公三项，共征小麦6,246,712公斤。抗战期间，全县共征输田、军、公三项27,450,364公斤。

三、踊跃捐款，涪川人民为了支前，不惜毁家纾难，自1937年起，有以下捐输：①先后五次，共募捐飞机款法币2,446,066元。②募集救国公债23,945元。③推募美国储蓄券11,917,300元。④募集战时公债两次，共76万元。⑤献金献粮(粮折交现金)两项，共25,327,680元。⑥筹募同盟胜利公债及美金公债两项共49万元。以上总计捐献法币40,964,991元。就地临时支应军用还不在于内。

四、为了加强支前工作，于1938年春，收纳有关组织，成立“涪川县抗敌后援会”。根据前方需要，征发、募集各种军需用品及医药用品，送省抗敌后援会收转前方。县城中心小学就募制棉被30条，衬衣60件。

文史资料

889

(124)

泾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廿七日

按：在泾川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一起日机轰炸阳保乡（今汭丰乡）事件。至今众说不一。最近，我们实地采访了当年被害者的亲属和现场目击者——76岁的乔治堂夫妇、74岁的白世明、申连云等老人，并通过翻阅泾川县档案馆藏《民国卷》及其它资料，对这起事件的始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刊登于后。

日机轰炸阳保乡追述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是年农历2月初，日寇为了轰炸兰州，从山西运城飞机场出动5架轰炸机，经本县阳保乡（今汭丰乡）上空，其中的一架敌机先在百烟村掷下1枚炸弹，炸死炸伤7人，继在卅梁村掷下3枚炸弹，炸死1人，引燃了薛存德家一个麦草垛，后在枣林子村掷下3枚炸弹。3个村被炸，百烟村尤烈。

一天上午，农民刚从地里种豌豆返家，有的正在吃饭，有的还在安顿农活。突然，天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几个好奇的村民惊叫着“快看飞机”远近村民都纷纷出门仰望，只见天空从东南方向飞来几架“一”字型的机群，低空掠过，就连机翼上的文字都看得一清二楚。忽然，一架飞机猛向下俯冲，掷下一枚炸弹（档案记载重30磅），落在乔永保家的院墙外。当时他家里的几个人只顾向天上看，脑子还未反应过来，就倒在了血泊中。邻居们只听炸声如雷，硝烟弥漫，土雾升腾，哭叫声四起，跑过去一看，乔永保的儿媳、次子和两个女儿以及隔壁其弟乔永玺之妻等5人已被炸死。炸伤2人，损失二家财产约400元。卅梁村炸死的叫薛存德。

（焦宏明采访整理）

76.07

文史资料

894

(140)

泾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 年 九 月 六 日 六

再谈牛角沟智人

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是近二十年内发展起来的。最主要的成果即是牛角沟智人的发现与研究。

一、牛角沟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经过1972年，泾明公社干部刘玉林在下队期间，曾于牛角沟的土坡上采集到了一块人类头骨化石。当时，省、地、县文物工作者只能肯定这块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然而，旧石器时代在中国目前的发现跨度在一至一百多万年。化石仅只有一个头盖骨，要判断得准确仅从外表观察是得不出结论的。化石得不到准确的断代，其余无从谈起。就这样，牛角沟人类化石在刘玉林家中存放了近十年时间。到了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从北京来到兰州，准备赴庆阳地区看看那里的旧石器发现地，听省博物馆同志介绍了泾川出土人类头骨化石的情况，随即来

到平凉，在地区群艺馆文博干部张映文陪同下又来泾川找到了刘玉林。贾兰坡细致地看了化石，并到牛角沟化石出土地查看了地层之后，建议将化石送北京进行鉴定。很快就有了初步的鉴定结果。刘玉林便写了一则题为《泾川发现晚更新人化石》的消息在《光明日报》发表。继而，刘玉林动手写关于化石的研究论文。写了好几篇，专业杂志社都不刊用，认为只能是个“考古调查报告”。这时，刘玉林已调平凉地区群艺馆从事文博专业工作。逐渐认识到古人类的研究是一门较深的专门科学，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谈不上研究的，所以，将第一手资料转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黄慰文、林一璞。刘玉林写信给黄慰文联系时，黄正在出国考察，黄的妻子认真地代写了回信。黄回国后便通过信件联系，又请甘肃省博物馆的谢骏义同志再次赴牛角沟核证了地层关系。论文终于在1984年的《人类学学报》上发表。题为：《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

二、化石的鉴定结果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牛角沟发现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属于蒙古人种，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头骨，年龄约在20岁左右。化石所处的时代可作比较的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和“峙峪遗址”。也就是说与这两个遗址的时代相当。

“萨拉乌苏”是蒙语“黄水”的意思。遗址处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沿岸。测定的年代距今在5万年至3.5万年。

“峙峪遗址”在山西省朔县，测定的年代距今在2.8万年左右。

所以，我在《泾川一览》中介绍泾川人类化石时将上限取在5万年，下限取在2.8万年。这是因为泾川的人类化石体积有限，不能取样作碳十四测定更为具体的年代。论文中所认为的时代还经过同一地层发现的动物群化石，以及典型石器类比而言的。在这里，化石时代的上限“5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是论文认为不能突破的时限。许多同志在引用这一资料时，以为越早越好，或不精心地将牛角沟人类化石称在“5万年以前”。这种简单的归纳概括恰恰出了界线。因为在距今5万5千年左右的华北旧石器时代考古代表是“丁村遗址发现的丁村人”。考古界认为“丁村遗址”与“萨拉乌苏遗址”的区别，前者处在中期智人阶段，后者处在“晚期智人阶段”。牛角沟的人类化石被认为是晚期智人，而不是中期智人。

这篇论文发表至今已有四、五年时间，还没有看到对上述鉴定产生疑义的争论文章。在1987年8月北京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这部巨书中，提及泾川牛角沟人类化石的观点亦是按这篇研究性论文的看法。

三、泾川晚期智人化石的学术价值

论文说，泾川牛角沟人类化石的发现，以及周围的同层动物群和石器的研究对“泾渭文化”的渊源问题产生了新的争鸣。

“泾渭文化”是不久前盖培、黄万波同志在“陕西长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物”（1982年《人类学学报》）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与丁村文化为代表的“汾河文化”同时地、

平行地发展，但文化性质上是差别很大的文化”。同时还认为：“在华北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水洞沟文化最接近泾渭文化，它可能导源于泾渭文化”。

以上的意思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泾渭文化应放在旧石器中期，其次是泾渭文化来源于水洞沟文化。泾川牛角沟化石及石器的论文对以上两点持否定态度，应用泾川的发现说明“泾渭文化”的提法不能成立，泾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与水洞沟文化的渊源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四、当地与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有关的人和事

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平凉地区占着重要的地位。从目前的发现来说，其它各县尚没有重要发现和研究。牛角沟化石的研究不仅在全省，在全国亦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这项工作的收获，是与泾川当地几位同志的艰辛工作分不开的。

首先是上文中提到的刘玉林。他是泾川人，在未从事专业文博工作之前利用业余时间几乎跑遍了县境内泾河东段的沟沟岔岔，为确定我县境内的旧石器遗址提供了许多线索和物证。如果不了解全区其它各县旧石器考古几乎还处在零线的现状，就看不到他的工作的意义。

另一位要提到的是陕西籍的张映文同志。他曾在泾川文化馆从事专业文博工作多年，现已去世。他曾与省博物馆谢骏义同志联合对飞云乡的南峪沟和桃山咀旧石器遗址首次作了较为细致的调查，调查报告发表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上，为泾川智人化石的研究

一。同时，他提携刘玉林同志从业余走向专业，是涇川考古工作的开拓者。

（刘映祺）

2007

文史资料

(230)



政协泾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十月七日

泾川牛角沟晚期智人化石发现经过

泾川牛角沟智人化石是甘肃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人们都知道它是一件珍贵的人类遗骸，但对它的发现过程及文物价值却了解甚少，说法不一，为此，笔者采访了刘玉林和几位亲历、亲见、亲闻过的同志，现将有关情况整理于后，以飨读者。

狩猎发现“石球”

1963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的刘玉林，被分配到县兽医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下放到泾明公社。在基层工作之余，他凭着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对文博工作的执着追求，一边狩猎，一边搞文物调研，捡到了许多动物“骨头”和石器。

1974年3月5日，他在泾明公社郝白大队东沟狩猎时，发现了人工打制的一个石球和两件石片，带回家中认真琢磨，潜心研究。他认为该处位于泾河上游，石球是在这条冲沟底部现代河床的砂砾石中捡的，估计是由附近的第四纪黄土层中冲刷下来的；石球人工痕迹清楚，上面有较厚的石锈，初步确认这就是旧石器。后来他在这里又发现了古生物化石，一种旧石器遗址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产生。他把此事告诉给地区群艺馆文博干部张映文和省博物馆谢骏义二位同志，张、谢看了刘玉林发现的石球和其他石器、化石，认为是旧石器，但不十分肯定。1974年10月6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学部委员贾兰波赴庆阳考察路过泾川，听说刘玉林发现了旧石器，便专程登门察看。当刘玉林从他的办公桌下拿出石球时，贾兰波教授惊讶地连声说：“就是这个，就是旧石器。”贾教授还到东沟实地察看了含三趾马的灰绿色地层，认为刘玉林同志发现的这个地点很重要，估计这里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会很多，再三叮嘱要多跑多看，特别是大雨过后。后来，刘玉林一有空就到这里调查，发现遗物，先后跑过二十几趟，捡回了许多珍贵标本。1976年，刘玉林同志在《化石》杂志上以《甘肃泾川发现旧石器》为题对“石球”作了报道。1977年谢骏义、张鲁章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第三期发

表的《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一文中脚注：“刘玉林同志于泾川县泾明公社郝白大队东沟发现了一件紫红色石英岩石球，可惜已脱离原生地层，时代尚难肯定，从附近没有新石器时代遗存看，可能属旧石器时代遗物。”1979年4月，在方大钧等人合著的地质专业教科书《古生物地层学》第一章收入了石球图，并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石球（甘肃泾川×1/2）”。1983年8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人类旧石器概要》第89条对石球作了全面记载。“地理位置，甘肃省泾川县白家村泾河右（北）岸东沟前段牛角沟。县城北偏东 14° ，距60华里， $35^{\circ}21'N$ ， $107^{\circ}39'E$ ；地貌与地层，可能为上新流黄土层；遗物，石片二件，石球一件，遗物发现时均已脱层；时代或年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献，刘玉林《化石》1976年第1期‘甘肃泾川发现旧石器’。

植树造林挖出了人化石

1976年3月中旬，泾明公社2万多名劳力在郝白大队东沟进行着5000多亩植树造林大会战，开挖深度多达1米左右。动工以来，驻队干部刘玉林一边在工地上巡回检查指导工作，一边“看地”，收集古董。开挖第三天上午九点左右，他在沟口通往白家塬的斜沟（牛角沟）的一个土坎上，发现了群众挖出露在这里的人头颅骨后半部一大片，包括完整的枕骨和顶端的

一部分，呈淡褐色，有一定程度的石化。他便把在这一段上开挖的几个群众叫来，现场了解了头盖骨埋藏的确切位置及出土时的情景。后多次在周围寻找，找到了顶骨、颞骨、面骨、上颌等碎片，把它粘合在一起，使这些破碎的残片成了一件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当时，人们都说刘玉林胡闹，把死人“骨头”带回家中，真吓人。但这对于喜爱文物，懂得文博知识且稍有一定鉴别力的刘玉林来说，真是如获至宝。他经常和老婆、娃娃用舌头沾吊鉴别，到现场调查取证，翻阅资料对比研究。1976年5月，平凉地区展览馆馆长刘惠带领地区文物普查队来泾考察，队员张映文见到了人化石。1980年10月，省博物馆谢骏义来泾川调查文物工作，他们在已调平凉地区群艺馆工作的刘玉林处看了人化石后都说很有研究价值，但对化石的具体情况却无法说明。为了尽快搞清泾川境内的古人类活动情况，刘玉林同志曾多次和谢骏义、张映文、省地质队的李应涛、城关中学历史教师何浩林等文物及历史专家赴他自己多年来发现的南峪沟、合志沟、大岭上、宋家、牛角沟等重要遗址普查、复查，初步推断确定了宋家、大岭上可能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对牛角沟重要地段挖了探沟，找到了许多石器和伴生动物化石。1981年《考古与文物》第二期，张映文、谢骏义发表了《泾川南峪沟和桃山咀旧石器遗址》一文。

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牛角沟人类头盖骨化石提供了大量依据。

保存送鉴人化石

人头骨化石出土后，在刘玉林同志身边度过了五个春秋，给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异样的乐趣。1980年初，刘玉林同志调地区群艺馆工作后，就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调查资料和采集的石器及动物化石标本，着手整理泾川发现人头骨化石的论文。1981年10月，群艺馆馆长李鸿文去承德学习时，刘玉林借机随他一同先到了北京。10月16日，刘玉林将他发现的象牙化石和“恐龙蛋”皮化石分别交给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宗冠福和赵资奎鉴定。17日上午见到了贾兰波和同所的卫奇同志，送交了人头骨化石。贾教授当场认定是属晚期智人的头盖骨化石，立即叫来工作人员把人头骨拿去重新粘结修复。在京期间，刘玉林同志在卫奇陪同下参观了研究所的合县猿人头盖骨化石、许家窑人头骨化石和南方古猿、巨猿及中国猿人牙齿化石（真品）、周口店猿人遗址及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出土的人化石材料复制模型。临走时，贾兰波、卫奇叮咛刘玉林回到平凉后先写出调查报告，同石器及动物化石标本一起寄他们研究。

1981年12月21日，刘玉林把亲笔撰写的《甘肃泾川县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调查报

告，同86件旧石器、3件骨器、28件化石、2块土样寄给了卫奇。1982年1月17日、4月5日卫奇先后两次来信说明收件和对报告的修改意见，表示人头骨化石可以报道一下。4月12日，刘玉林写了《泾川县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的新闻稿，为了慎重其事，他把稿件先寄给卫奇、贾兰波、谢骏义作了修改。5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了《泾川县发现人类头骨化石》的消息，之后，《甘肃日报》、上海《文汇报》、《甘肃工人报》、《兰州晚报》、《平凉报》等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宣传。

刘玉林同志工作谦虚谨慎，一丝不苟。为了使自己的论文更加充实，有说服力，并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他又托卫奇将石器和人头骨分别交给了本所专门研究石器的黄慰文和专门研究古人类的林一璞处理，并同意论文以他们三人联名发表。1984年2月，泾川人头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认真研究论证，终于有了定论。认为刘玉林同志发现的这具人类头盖骨代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它在人类进化系统中处于晚期智人的地位，它所显示的人种方面的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同年2月《人类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刘玉林、黄慰文、林一璞三人署名的《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论文。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686页，中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条载记载了泾川的晚期智人化石。这一重大事实的发现和确认，证明了泾川在五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生存，为研究泾川人文始祖的历史提供了确凿证据，填补了甘肃人类化石发现史上的空白。泾川人头盖骨化石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

人化石的发现者刘玉林

刘玉林，男，汉族，生于1940年12月，泾川县城关镇人，大学文化程度，现任平凉地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省政协委员。上中学时他就喜欢历史，在农大畜牧系学习时，对人体、动物解剖学学习精深，钻研透彻，步入社会后，爱收集古董，人们称之为“爱看地的人”。刘玉林同志文博知识丰富，集藏了许多陶瓷器、青铜器及不少文物标本，先后都无偿捐献给国家。在文物考古上，他建树颇丰，除发现了泾川晚期智人化石外，1976年秋，他同原城关中学教师何浩林在泾川县太平乡梅家洼岭背后村的大岭上平田整地时，于红色土层中挖出了几件石制品，多次调查，获得了一些新材料，经有关方面核实论证，确定为中更新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这一发现，把甘肃省有人类存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五、六十万年，说明泾川至少在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这样的早期地点在省内还未发现第二处。1981年，他听说一位农民把挖

到的一块龙骨卖给了药材站，就立即赶去好说歹说，把已经打碎了的“龙骨”赎了回来，拼到一起后对来龙去脉进行了跟踪调查和现场勘察。经初步研究，认为很可能是一种还未发现过的大象的牙齿，后来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确认是古菱齿象的新种化石，由于是世界范围内首先在平凉发现的，故定名为“平凉古菱齿象”。二十多年来，刘玉林同志的研究成果丰硕，其论文屡屡见诸于《史前研究》、《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文物资料丛刊》等国家级刊物上。他的《甘肃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庄浪龙眼山摩崖造像》、《甘肃泾川发现的早周铜鬲》、《甘肃静宁发现的金代墓葬》等二十多篇论著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主编的《平凉文博》资料集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刘 泰采访整理)